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文學思潮

建安時代，由於政局迭蕩和戰亂頻仍，使得人們不再以儒家思想作為立身處事的唯一圭臬，開始掙脫禮教束縛轉而重視人的價值。這樣的思潮轉變反應在文學上，文學美的功能得以彰顯。如此的時代氛圍，給予建安作家深遠的影響。劉楨為建安七子之一，故其作品必受當時環境影響而展現出獨特的風貌。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¹今所謂知人論世，故欲明劉楨之作品風格特色，則不得不就其所處時代背景作一析論。

第一節 政治情勢與社會環境

劉楨（西元?~217年），字公幹，東平國寧陽縣（今山東寧陽縣人），他是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員及建安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建安是東漢獻帝的年號，自漢獻帝遷都洛陽，是年改元為建安，至曹丕竄漢，獻帝被廢為山陽公，其間凡二十五年（西元 196-220年），史稱「建安時代」。建安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動亂年代，然在文學上，正因政局迭蕩，詩人們在詩歌中表露對漢帝國的憂心，對身處亂世的不安，因此而綻放出異樣的光采。故要對劉楨的作品與創作有更清楚的認知，便必須了解其生活時代的社會政治與學術思想，才能窺其作品全貌。

¹（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孟子·萬章下》（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90年），頁188。

一、政治情勢

（一）政權紛擾的王朝

東漢王朝自建國以來，經過光武帝、明帝的勵精圖治，發展至章、和帝時期，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達到空前的繁榮，然這也是走向衰亡的開始。東漢自章帝後，諸帝皆年幼即位，母后臨朝聽政，導致大權旁落。而後幼主漸長，必然不甘於傀儡地位而倚重身旁的宦官，希望藉其之力除去外戚，於是形成外戚宦官兩大集團競相奪權，交相殘殺的局面，東漢王朝自此走向敗亡。

東漢宦官、外戚間的鬥爭，始自和帝。章帝死後，其子繼位為和帝時，年僅十歲，因而由其母竇太后親臨朝政，為鞏固自己的政權，竇氏大量倚重其父兄，竇憲以皇太后之兄的身份為大將軍輔政，一門兄弟子侄都居要位，食封邑，領禁兵典宿衛以握軍權。地方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官僚士大夫也多依附竇憲，形成外戚集團獨斷專權之勢。至和帝漸長處事多有制肘，對其舅父心生猜忌，於是，宦官鄭眾等趁機為和帝謀劃，將竇憲黨羽一舉收捕，奪回政權。《後漢書·宦者列傳·鄭眾傳》：

時竇太后秉政，後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²

替和帝除去外戚後，鄭眾等宦官因此得以封侯升官，此時宦官開始得勢，這是宦官與外戚的第一次交鋒。自此，東漢政權就在外戚與宦官的爭奪打鬥中搖來晃去，皇帝就似任人擺弄的布娃娃，完全成了傀儡。

和帝死，出生僅百多天的殤帝立，不到數月死。而後年僅十三歲的安帝即位。鄧太后臨朝聽政，鄧騭兄弟掌權，再次形成外戚專政的局面。安帝死後，順帝即位，梁氏秉政，以其父梁商、兄梁冀先後為大將軍執政。梁冀又先後擁立沖、質、桓三帝，掌權達二十餘年，是東漢外戚中無有比擬的權臣，自此，外戚專權之勢達於頂峰。《後漢書·宦者列傳》云：

²（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宦者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8月），卷78，頁2512。

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恆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³

梁冀身為大將軍執政，又有皇太后、皇后兩個妹妹鎮守宮中，官員多為其黨羽。桓帝即位後，因長期為梁冀所控制，又害怕自己受其所害，所以當梁太后、梁皇后死後，便暗中將宦官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收為心腹，共謀剷除外戚梁冀。然事成後，政權並未回到桓帝的手中，而是為宦官們所掌握，單超、徐璜等五人因誅外戚有功，同日封侯，世稱之為五侯。《後漢書·孝桓帝紀》：

壬午，立皇后鄧氏，追廢懿陵為貴人冢。詔曰：「梁冀姦暴，濁亂王室。……禍害深大，罪釁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勳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漏刻之間，桀逆梟夷。斯誠社稷之祐，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勳。其封超等五人為縣侯，勳等七人為亭侯。」⁴

宦官擅權後政局較外戚執政時更加腐敗混亂，他們把宗族親戚派到地方上擔任刺史、太守，貪贓枉法，榨取民財，形同盜賊。《後漢書·五行一》：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

5

宦官當政後，許多官僚士紳為了謀求私利，也巴結宦官，因此他們大量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然而，活躍在東漢政治舞臺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還有官僚和儒生。東漢中葉以後，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他們任人唯親，裙帶成風，使官吏選舉制度更加流於形式，

³ 同註 2，頁 2520。

⁴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孝桓帝紀》，卷 7，頁 305。

⁵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五行一》，志 13，頁 3271。

這使得東漢末年政權日漸腐朽、黑暗，直至靈帝末年，宦官勢力達於鼎盛。

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促使士人與遭到排擠的官僚聯合起來，共同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終致釀成史上著名的「黨錮之禍」。東漢桓帝延熹九年，比較重名節的讀書人和名士，發出批評朝政，改善朝政的言論來攻擊宦官。宦官反而誣告李膺等名士與太學生私自組黨，批評朝廷。東漢桓帝於是捕李膺等二百餘人。第二年，雖然免除黨人的罪，但卻終身被軟禁，不得自由行動。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而後靈帝即位，也是母后臨朝，外戚主政的局面。名士想與外戚合作，殺掉宦官，但事機洩漏，造成外戚竇武自殺，陳蕃遇害，名士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捕全都死在監獄中；但也牽連太學生被捕有一千多人，被禁足的也多達六、七百人，這是第二次「黨錮之禍」。「黨錮之禍」在東漢後期的朝野間造成很大的震動。它使賢良忠義之士多受株連、慘遭迫害。士人目睹黨禍之慘烈，因為寒心，從此便不問政治，只求明哲保身。自此以後，士人忌口，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幾無遺類，東漢王朝走向滅亡之路。

中央政治既已敗壞至此，地方上的土地兼併情形更是日益嚴重，豪強地主對百姓的剝削與壓迫，激化了農民和地主的對立，復之以連年災荒，致使民窮財盡，終於在靈帝中平元年（西元 184 年）爆發了以張角為首的「黃巾起義」。其所到之處，燒殺劫掠，天下震動，由於黃巾橫行，漢宗室劉焉建議改州刺史為州牧，並給予軍政大權，結果卻反使地方豪強趁機擴展勢力，導致中央權勢日益不振，開啓群雄混戰之局面。

（二）群雄割據的亂象

中平元年（西元 189 年），靈帝崩，少帝劉辯繼位，由外戚何進輔政。時宦官擅勢，權卿朝野，何進為剷除宦官勢力，便與貴族官僚袁紹合謀，密召涼州牧董卓入京，企圖一舉殲滅宦官。不料事洩，何進反被宦官張讓所殺。袁紹因而帶兵入宮，盡殺宦官，控制朝廷。隨後董卓又率兵進入洛陽，據兵擅政，自為相國，廢少帝，改立獻帝，自此東漢王朝已然名存實亡。

董卓放縱士兵在洛陽城中大肆搜掠，殘殺無辜，使百姓飽受荼毒。《三國志·魏書·董卓》：

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雲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⁶

初平元年三月（西元 190 年），袁紹聯合關東各州郡興兵聲討董卓。董卓見關東聯軍勢盛，乃挾持獻帝西遷長安，臨行時把洛陽的金珠寶器、文物圖書強行劫走，焚燒宮廟、官府和居家，並脅迫洛陽幾百萬居民一起西行，致使洛陽周圍「二百里內無複孑遺」（《後漢書·董卓傳》），室屋蕩盡。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與董卓部將呂布合謀，終於刺殺董卓。卓部將李傕、郭汜率兵攻入長安，趕走呂布，殺死王允，長安大亂，死者狼藉。而後李傕、郭汜因不合而相互攻伐，獻帝趁機逃回洛陽，這時曹操採納謀士建議，將獻帝迎至許昌，董卓之亂大抵結束。

董卓之亂以後，各地軍閥趁機割據稱雄，各霸一方，天下遂成分裂之勢。當時的割據勢力，主要有河北的袁紹、河內的張揚、兗豫的曹操、徐州的呂布、揚州的袁術、江東的孫策、荆州的劉表、幽州的公孫瓚、南陽的張繡等。這些割據勢力，仍不斷進行兼併戰爭，殘害人民，使社會遭到嚴重破壞。

最初，袁紹憑藉特殊的家世及兵力，占有幽、冀、青、並四州（今河北、山西、山東東部），成爲最大勢力。而曹操則由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逐漸壯大軍力，成爲與袁紹分庭抗禮的一方。而後又將漢獻帝迎往許昌，造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地位。他重視生產，實行屯田，解決了軍隊糧食問題。善於帶兵作戰的曹操，於建安五年（西元 200 年），與袁紹決戰於官渡（今河南中牟縣東北）。此戰曹操以少勝多，敗袁紹後不但佔有青、冀、幽、並四州，也奠定統一北方的基礎。

⁶（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董卓》（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8 月），卷 6，頁 174。

（三）三國鼎立的局面

曹操一統北方後，原先相對弱小的劉備、孫權兩方勢力，也堅固的佔據長江流域。建安十三年（西元 208 年），曹操欲圖統一南方，因而揮軍南下，奪取荊州。時荊州的劉表病卒，次子劉琮不戰而降，操於是輕取荊州。而先前投靠劉表的劉備，則與劉表長子劉琦合作，退守夏口（今漢水入江處）。

此時曹操率領二十多萬軍隊自江陵（今屬湖北省）沿江東下，直逼夏口。劉備危急萬分，立即派諸葛亮前去江東聯合孫權，共禦曹操。孫權斟酌利害之下，便發兵與曹軍會於赤壁（今湖北蒲圻市西北赤壁山）。後因曹軍不習水戰，復以其內部矛盾甚多，反被孫劉聯軍大敗於赤壁，曹操率殘部逃回北方。自此，三分天下之勢逐漸形成。

赤壁戰後，各國戰爭並未因此停歇。建安二十五年（西元 220 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已「受禪」方式稱帝，並廢漢獻帝。國號魏，改元黃初，定都洛陽，史稱「曹魏」。

而劉備則於建安二十六年（西元 221 年），即曹丕稱帝的次年，自立為帝。國號漢，改元章武，建都成都，史稱「蜀漢」，簡稱蜀。

江東的孫權，赤壁之戰後，據有長江中下游一帶。後因爭奪荊州與劉備交惡。遂於西元 229 年正式稱帝，改元黃龍，遷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國號吳。史稱「孫吳」或「東吳」。從此，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完全形成。其後司馬炎代魏稱晉，並於太康元年（西元 280 年）滅孫吳，結束三國時代，中國正式恢復統一局面。

二、社會環境

（一）戰亂頻繁，人民困苦

東漢末年，在外戚與宦官的橫征暴斂之下，不但政治腐敗，社會經濟亦嚴重破壞。無論是外戚還是宦官，皆是貪贓枉法，搜括民脂民膏之徒。如外戚梁冀秉政期間，除政治上無法無天，生活上更是驕奢淫佚，奴役人民，《後漢書·

《梁統列傳》云：

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互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⁷

梁冀被誅後，被沒收的梁冀家財竟達三十餘億之多，占東漢全年租稅的一半，這些自然是從百姓手中掠奪而來，激起民憤甚大。

而宦官把持朝政、剝削百姓之暴行，更是無以復加。如侯覽便是一例，《後漢書·宦者列傳》云：

……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⁸

宦官仗恃帝王寵幸，胡作非為，對百姓勒索錢財，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腐敗至極。地主豪強勢力迅猛擴張，土地兼併現象日益嚴重。形成一個個「獨立王國」。大莊園裏以農業為主，農民成為莊園主長期奴役壓榨的對象，農民和地主間的對立日趨激烈。

東漢統治者不僅對漢族人民進行壓榨，更欺凌剝削少數民族，不斷激起各民族的反抗。東漢後期，州郡官吏和地方豪強對羌族人民更是恣意虐待和剝削，

⁷（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梁統列傳》，卷 34，頁 1181-1182。

⁸ 同註 2，頁 2523。

羌人「數爲」「小吏黠人」所「侵奪」，激起了羌族人民的反抗。《後漢書·西羌傳》：

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⁹

西羌人曾先後進行二次大規模反抗東漢王朝的抗爭，歷時五六十年。在此期間，耗費國庫大量經費，嚴重拖垮國家財政；而連年的征戰，士兵死傷無數，農村經濟衰退，人民生活困苦，終於在東漢靈帝時，演變成全國性的農民暴動——「黃巾之亂」。他們燒毀官府、殺害官吏、四處劫掠，一個月內，全國七州二十八郡都發生戰事，黃巾軍勢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動京都。而後亂事雖被鎮壓，但卻造成了造成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

（二）連年天災，農作歉收

在這種紛亂的政治局面中，受害最深的還屬老百姓。實際上自安帝以後，由於朝廷吏治腐敗，官府橫徵暴斂，加上長期對外用兵，耗費巨額經費，這些沉重的負擔，皆由百姓承受。更不幸的是，東漢王朝自中期以來，連年天災不斷，如：水災、霜雪雹、旱災、蝗災、地震接踵而至，使百姓生活更加困難。《後漢書》中，多有記載：

（1）水災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虛。¹⁰

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

⁹（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西羌傳》，卷 78，頁 2878。

¹⁰（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五行六》，志 18，頁 3363。

害者，悉為收斂；其亡失穀食，稟人三斛。¹¹

連年大水，使得農作損傷，稅收欠佳，因此食糧欠缺。人民也因為水災而死傷無數，於是朝廷乃廣開救濟大門，給予傷亡的家庭補助，若為七歲以上，則撫恤錢二千。而農作為大水淹沒以致無糧者，給予每人三斛的糧食補助。

(2) 旱災、蝗災

六月，蝗、旱。戊辰，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稿；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秋七月，蝗蟲飛過京師。¹²

夏四月，京師旱。辛巳，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京師及郡國十二蝗。¹³

連年不斷的蝗災及早災，使得農民辛苦所種植之農作物盡數損毀。在上位者為減輕人民負擔，於是詔令停收租稅。然這樣的情形並未好轉，旱災已使農作物損傷大半，繼之而起的蝗災又大量蛀食剩餘作物，讓農民的辛苦付出毀於一旦，可以想見當時百姓的困苦。

(3) 地震

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¹⁴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甲午，詔實覈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為收斂。乙未，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¹⁵

¹¹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孝桓帝紀》，卷 7，頁 319。

¹²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孝和殤帝紀》，卷 4，頁 183。

¹³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孝順孝沖孝質帝紀》，卷 6，頁 257。

¹⁴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孝安帝紀》，卷 5，頁 236。

¹⁵ 同註 13，頁 255。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¹⁶

地震無疑是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的最大災難，漢末地震規模之大，次數之多，百姓死傷人數難以估計。在這樣的災難下，統治者只能停收賦稅，讓百姓得以休養生息。若不幸死於地震者，也給與每人錢二千之撫恤，若全家皆死於震災，則由地方政府出面，為其處理後事。

(4) 疾疫

夏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除田租、口賦。¹⁷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又疫。¹⁸

在醫學不發達的年代，疾疫四處蔓延，造成百姓死亡無數，往往一地疫情才剛受到控制，另一地就又傳出災情，這樣交相蔓延的結果，是百姓因受到感染而大量死亡，即使朝廷派大夫四處醫治，仍舊無法扼止疫情的蔓延。

在黃巾之亂及群雄混戰當中幸運存活下來的人，又遭逢連年災禍，飢荒四起，以致出現了「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嚴重局面。大批農民四處流亡，餓殍遍野，連京師洛陽也是死者相枕於路。「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¹⁹的情況早已屢見不鮮。而可怕的疫疾流傳中土，生民多半死於戰亂饑饉，使得人口大量銳減。

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²⁰

政治腐敗、軍閥混戰、災荒頻仍，再加上聞所未聞的大瘟疫，使得整個中

¹⁶ 同註 13，頁 274。

¹⁷ 同註 14，頁 230。

¹⁸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五行五》，志 17，頁 3351。

¹⁹ (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董卓列傳》，卷 72，頁 2336。

²⁰ 同註 19，頁 2341。

原地區出現了大面積荒無人煙的情形。百姓飢寒交迫、流離失所，在文人的作品中也多所描述。如曹操〈嵩里行〉：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²¹

而王粲〈七哀詩〉中亦描述了當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可怕景象，可以想見人民死亡的嚴重程度。人口大量銳減，影響農業及工商業甚巨。自黃巾之亂到三國初年期間，中國北方經濟包括關中、中原和淮北在戰火、飢荒、疾疫的交相侵襲下，遭到嚴重的破壞。人民流散，只剩下斷壁殘垣。直至三國立國後，針對各地不同的經濟情勢，採取不同的措施，經濟才逐漸恢復。

（三）三國君主，精勵圖治

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形成後，雖然兼併戰爭仍舊繼續進行，但三國的統治者爲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因而非常重視社會生產的發展及社會秩序的安定。所以與東漢末年軍閥割據的紛亂局面相比，社會顯得穩定許多。

曹操統一北方後，便致力於穩定北方地區的社會秩序，大力生產，恢復經濟。因而首先頒布〈置屯田令〉：

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²²

曹操效法商鞅及漢武帝實行屯田，他發動軍民開墾荒地，種植糧食，目的在於強兵足食，因此「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²³」解決了當時人散田荒，軍民乏食的問題。經過數年的努力，成效非常顯著。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軍糧的供應得以穩定。

²¹ 唐滿先：《建安詩三百首詳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12月），頁12。

²²（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卷1，頁14。

²³ 同註22。

其次，東漢末年豪強地主大肆兼併土地，欺壓百姓，激化農民與地主對立的問題，爲了穩定政治局面，曹操於建安九年（西元 209 年）平定袁紹後，頒布〈蠲河北租賦令〉：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²⁴

這道命令免去百姓一年的租稅，剛一發佈，便博得了廣大民眾的歡迎。而後，又頒布〈抑兼併令〉：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銜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于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絲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²⁵

袁紹佔領冀州後，放任部屬及轄區內的豪強地主肆意凌壓百姓，擄掠財物，使廣大農民更加貧困。曹操深知要穩定統治秩序，須抑制兼併，打擊豪強，故頒此令，廢除漢代租佃制度，禁止任意轉嫁稅賦給弱民，既取得百姓的支持，又壯大自己的勢力，鞏固了北方的統治。

在用人選才上，曹操堅持「唯才是舉」、「任賢用能」的原則，任用真正具有真才實學之人，受到天下士子大力擁戴，奠定穩固的政權基礎。

在此同時，蜀、吳也各自採取有利可行的措施，恢復生產，安定人民生活。蜀地物產豐富，經濟破壞較小，諸葛亮採取「務農殖穀，閉關息民」的措施，注重耕種，興修水利，大力發展農業，使蜀國的經濟得到很快的發展，出現了「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積蓄饒」的局面。

孫權統治江東達五十餘年，他對農業生產頗爲重視，赤壁戰後，孫權迅速向長江以南擴充地盤，而長江下游在孫吳政權的悉心經營下，爲東南地區經濟的開發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吳國的冶鐵、紡織、煮鹽業都很興盛，其中青瓷製作更是著名。而爲適應水戰和交通之需要，造船業也有重大的發展。

²⁴ 同註 22，頁 26。

²⁵ 同註 22，頁 26。

三國的統治者為求穩定政權，因而各自採取的許多政治、經濟措施，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農業經濟逐漸復甦。將自漢末因動亂而衰退的社會，轉而經營為適合生活且穩定發展的環境。

劉楨在歷經了董卓對東漢王朝的暴虐摧殘之後，深刻體會到戰亂生活帶給人民的災難。而建安時期，曹操一統北方後所採取各種措施，使整個社會由動亂而漸趨穩定，促進了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故劉楨視曹操為「明主」主動歸附。歸曹後，劉楨創作了許多作品，都深刻反映當世的社會現實。

第二節 學術變遷與文學思潮

政治的變遷對社會的影響甚劇，東漢至和帝以降盛世遠去、帝國日漸衰微、政局腐敗之下造成軍閥亂政、生靈塗炭。此時的文人身為漢帝國的中堅份子，肩負儒家道統，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眼見此景在精神上所承受的煎熬，使得其思想及觀念與承平之世的文章人相比，在個人的探索與對仕途的追求上，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一、學術變遷

東漢末年以降，政局動蕩不安，國境之內烽煙四起，人們的價值觀也日漸轉移。自漢武帝起以儒學為中心價值的思想因時代的動盪而重新被檢視。文人在生命朝不保夕的威脅之下，逐漸將學術的重心轉向以老莊為主的玄學。

（一）儒學衰退

自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以來，儒家學說便居於各家學說之首，成為與政治結合的統治思想。漢代又設立官學，治經遂成為利祿之途，士子無不靡然從之；加以帝王獎掖，使儒家思想無論於政治、社

會、學術各方面皆居於獨尊之領導地位。

然自東漢以來，儒生說經，已雜讖緯之說，資質大多失真。發展至漢末魏晉時，士人研經徒拘泥於章句訓詁，經典義理反而不受重視，經學僵化，流弊叢生。《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敘》云：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固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矣。²⁶

班固舉古代學者注經之法，來抨擊後世經學家們終其一生皓首窮經，於實學卻毫無裨益。《後漢書·鄭玄傳》亦云：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秉，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²⁷

漢代儒生因篤守師法、家法，造成各家學說日漸分歧，於是出現所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的局面。因而導致儒生說經時牽強附會，斷章取義。儒學發展至此，弊端日久彌深，已成不可收拾之地步。有識之士對此提出了抨擊，如王充《論衡·謝短篇》：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今，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夫儒生

²⁶（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8月），卷30，頁1723。

²⁷（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鄭玄傳》，卷35，頁1212-1213。

不覽古今，所知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²⁸

王充以爲今之儒者由於盲目尊經，因此流於閉塞固守，且因受限於五經，所以不能通識今古，使得儒家思想日漸蔽塞。

東漢後期外戚和宦官專政，釀成兩次「黨錮之禍」，士人受到殘酷的迫害，隨後發生的黃巾之亂，乃至於建安年間的軍閥混戰，東漢王朝實際上已名存實亡。致使爲了維護君主專制而存在的儒學倫常綱紀，完全崩潰。復之以連年天災、兵禍不斷，社會失序，災禍屠殺四起，儒家固有之禮法制度，全然崩壞，儒學至此失去原先的統治地位與支配人心的力量。魚豢於《典略·儒宗傳序》云：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

29

於此亂世，欲整頓朝政綱紀，恢復社會秩序，並非儒家之仁術德化所能收效。是故建安末年曹操秉政後，以爲欲挽此頹風，必采申韓之術以撥亂返治，故行唯才主義，用人以「才」不以「德」，此舉乃是對儒家取士以德的激烈反抗，操之取士標準，由其所頒佈的建安四令之中可以識其大凡。建安年間，曹操曾四次下令求才，以明對人才的重視。如建安八年庚申令：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鬪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³⁰

此令在說明曹操對於有才有功者必給與官祿及賞賜，以顯示其重視人才，有功必賞的態度。又建安十五年下求賢令：

²⁸ (漢)王充撰：《論衡·謝短篇》(臺北：新興書局，民國57年)，頁36。

²⁹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台北：宏業書局，民國64年8月)，頁1297。

³⁰ 同註22，頁24。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魏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³¹

此令正說明了曹操身處天下未定之時，正需要賢才為其所用，是故「唯才是舉」，明確揭示用人以才不以德之政治理念。又建安十九年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³²

曹操此令，借用陳平、蘇秦之例，說明一個人雖品德行為上有所缺失，但其才能則仍應受到肯定，不可因德行舉止有陋而否定其才能。又建安二十二年令：

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臣平復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降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³³

曹操生逢社會動盪，民生凋弊之世，百廢待舉，需才殷切，自無暇顧及才德兼備之士，故雖污辱見笑之徒，盜嫂受金之輩，亦予以官職，拔擢重用。其所頒之詔令，明確揭示「用人唯才」之觀念，用人不拘流品，此詔一出，扭轉世人固有道德觀念，人皆棄節賤德，士人摒棄倫理，毀敗信義，光武所倡氣節，

³¹ 同註 22，頁 32。

³² 同註 22，頁 44。

³³ 同註 22，頁 49。

至此蕩然無存。儒家維持數百年之道統，消失殆盡，士風敗壞，有如黃河潰堤一般，沛然莫之能禦。明末顧炎武批評：

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跣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滅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³⁴

顧氏所言，至為愷切，魏晉時代士風之轉變，操之政策，可謂影響甚巨。近人陳寅恪亦云：

孟德三令，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肖貪詐之汙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根據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³⁵

漢代獨尊儒術，儒家學術及周孔道德，為漢代士大夫言行舉止之準繩，但曹氏求賢，公然宣稱「勿拘品行」、「勿廢偏短」，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亦兼而用之，造成當時士風丕變。《魏志·武帝紀》：

初，公初舉孝廉。袁州叛，公曰：「唯魏種不棄孤也。」及聞種走，公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擒種，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³⁶

此在說明曹操用人，並不因為其德行上的缺失而全盤加以否定，即便像魏

³⁴ (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湖南：岳麓書社，西元1994年5月)，頁469-470。

³⁵ 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收錄於《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頁146-147。

³⁶ 李建中：《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頁27。

種這樣棄主而走之徒，為曹操所擒後，仍舊因其具有長才為操釋放。

又《三國志·魏書》卷九〈曹爽傳〉注引《魏略》載丁斐事：

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補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³⁷

丁斐生性好利貪財，然卻因曹操愛才，故屢次犯法皆平安無事。而後雖因私易官牛入獄，曹操仍以丁斐之才可用而復其官位，足見曹氏愛才之心。

又《三國志·魏書》卷十〈荀彧傳〉注引〈彧別傳〉：

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³⁸

此說明只要是人才，縱使此人有負俗之譏，曹操仍然以其才而舉之，因此得以見用於當世。

又《三國志》卷十四〈郭嘉傳〉：

初，陳群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³⁹

以上數人在德行上雖無足稱道，然皆以才而受重用，此舉對於漢代士人奉為圭臬之孔儒道德倫理，無異是釜底抽薪。魏晉士人人格之重塑，自曹操標榜唯才主義後有了重大變革。文人思想的解放，影響了文學的發展，創作的內容及思想不再受限於儒家思維的束縛而有不同於以往的表現，文學自身的價值開

³⁷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卷9，頁289。

³⁸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卷10，頁318。

³⁹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卷14，頁435。

始受到重視。

(二) 玄風漸興

曹丕繼位後，相當傾慕漢文帝時代的道家政治。對於曹操之嚴刑峻法，任謀重詐的政策，不甚贊同，其思想傾向道家，是故於繼位後，接連下《息兵詔》、《輕刑詔》、《禁復仇詔》、《薄稅詔》等等重要的命令，無非是想將道家無為思想應用於政治，希望少用刑罰，與民休息。其《輕刑詔》：

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息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猛於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應議輕刑，以惠百姓。⁴⁰

丕乃承襲父業而登上王位，不似曹操起於金戈鐵馬，遍地烽煙之亂世，所採行的法家政策。曹丕文學氣息濃厚，個性自由曠達，不受拘束，是故崇奉文帝輕法息兵的黃老政治。於是上者倡之、下者和之，自然助長玄學與曠達之風，而儒學自是更趨衰微。傅玄《舉清遠疏》：

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外矣。⁴¹

魏武的貴刑名，魏文的慕通達，將兩漢苦心培植三百餘年之倫常綱紀與道德哲學，摧毀殆盡，是故終六朝之世，士風敗壞，人心澆離，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曹氏父子之摧殘節義，鄙棄名教，實不能辭其咎也。⁴² 魚豢《魏略·儒宗傳序》：

從初平之元〈漢獻帝年號〉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學尤甚。……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

⁴⁰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文帝丕》，卷2，頁84。

⁴¹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傅玄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8月)，卷47，頁1317-1318。

⁴² 張仁青：《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67年12月)，頁172。

吏二萬餘人，雖複分佈，在京師者尚見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乎！學業沉隕，乃至於此。⁴³

自初平至正始年間，雖短短六十年，然儒學竟衰微至此，無怪乎魚豢有此慨歎之詞。面對長久以來領導社會人心的儒家思想已崩潰瓦解，而外在現實社會又是如此的空前混亂，是故士人嚮往自由曠達的生活，反對禮教束縛，行爲狂放任誕。如竹林七賢：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⁴⁴

阮籍性格豪放，生活放浪，行事但憑自然個性，醉臥鄰婦家中而不避嫌，不因儒家禮法而有所拘束，常有不同於世俗眼光之行爲，這正是黃老思想對儒家思想的反動。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禪衣，諸君何為入我禪中？」《世說新語·任誕篇》。⁴⁵

劉伶的行爲更是荒誕不經，不但縱酒放任，有時甚至脫去衣服，赤身裸體地待在屋子裏。其行爲常爲世俗所譏，然劉伶依然不改其放蕩行爲，顯示出在黃老之學盛行，玄風大興之下，士人對於傳統禮教束縛之鄙視。《晉書·王戎傳》：

(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圓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奢，不自奉養，天下人魏之膏肓之疾。女士裴頡，貨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

⁴³ 同註 29。

⁴⁴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阮籍傳》，卷 49，頁 1361。

⁴⁵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南：文國書局，1998 年 5 月)，頁 356-357。

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棄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⁴⁶

王戎長於清談，但個性貪財好利，早年在荊州刺史任上就曾私派部下修建園宅，因此被免官。他經常手執牙籌計算自己的財產，日夜不輟。但又十分儉嗇，自己坐擁萬貫家財卻不捨得花掉。即使自家親人也是錙銖必較，分文必取，證明此時文人雖文采過人，但其德行往往無法與文采相提並論。

諸子之舉，使得老莊的思想，由學說而見諸行動，使得以往文人只是以口頭或文字反對儒家的禮法，轉而為實際的行動。生活放達任誕，行為放蕩不羈，士風頹壞。對人物的品鑒，接續漢末以來重才的標準，儒家重德之標準明顯被淡化。反映魏晉風度之《世說新語》于「德行」之外，別置「言語」、「文學」、「識鑒」、「賞譽」、「品藻」……等數類，從不同方面顯示出魏晉所標舉的才性之美。文人重視個性上所呈現的才性之美，而非儒家所標舉的德性之美，是故士人由從前強調才德相合而趨向才德分離，如潘岳，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讚其：

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于哀誄，非自外也。⁴⁷

此乃就潘岳之文學才能來論述，潘岳的文思敏捷，文章的言辭和旨義都很流暢，其《西征賦》表現了他所有文采，還有餘力在哀誄的寫作上展現才華，這是因為他本身即具有高度的才華之故。然而《文心雕龍·程器篇》又譏其：

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于賈、郭，……。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⁴⁸

潘岳文采雖高，卻假寫禱告神明的文章誣陷愍懷太子，文人縱使有特出的才華，但在行為上卻仍有缺失。透過文心雕龍的論述，可知當時文德分離之風盛行，是故對文人之才與德便可分而論之，不似儒家取士重才德相合。《晉書·潘岳傳》：

⁴⁶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王戎傳》，卷43，頁1234。

⁴⁷ (梁)劉勰撰，王更生導讀：《文心雕龍》(臺北：萬象圖書，1997年5月)，頁367。

⁴⁸ (梁)劉勰撰，王更生導讀：《文心雕龍·程器》，頁380。

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謚，每候其出，與崇折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幹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⁴⁹

晉書此論，說明了潘岳雖才華過人，但卻因為利益而寫文章陷害國之儲君。足見當時人品並非與文采成正比。而對潘岳才性離異最著名之表述，是金人元好問於其《論詩三十首》中所云：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⁵⁰

此詩透過對潘岳之批評，來說明詩才與詩人之德須相互配合，言行一致，表裏如一，潘才與潘性，形成一種強烈的反差，《晉書》於《潘岳傳》後的「史臣曰」中有如此慨辭：

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綸。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幹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⁵¹

依儒家「文如其人」之理想人格，「斯才」不應有如此「斯行」，漢魏之際，曹孟德以重才輕德性之人才思想，重塑鄴下人格，中斷孔儒人格模式，繼之以曹子恒崇奉黃老，而致漢魏之交，竹林諸子暢情任性，越名任心，才與性遂呈離異之狀。在此情形之下，儒學自然日益衰微，談玄說理之風日盛，是故文學自然受到影響而有所變革。

二、純文學思潮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是故劇變的時代必然會對文學產生重大影響。建

⁴⁹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潘岳傳》，卷55，頁1504。

⁵⁰ 方滿錦：《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研究》(臺北：萬卷樓出版社，民國91年9月)，頁180。

⁵¹ 同註49，頁1525。

安文學之所以興盛，與其時代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建安時期，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重大轉變的階段。雖然政治衰弱不振，但在文學上卻是一個蓬勃發展，具有突出成就的時代。造成此期文學思潮轉變的因素甚多，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云：

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西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悅，倪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端於此，三也。⁵²

劉氏此論，說明了建安文學之所以大異於前朝之因。兩漢之世，儒家思想與政治力量結合，立於獨尊之地位。文學只是經學的附庸而無獨立之地位；建安時期，曹操動搖漢以來儒學獨尊之地位，並實施嚴刑峻法，形成簡約嚴明之文風。他不以儒家思想禁錮士人，使其從傳統道德觀念的思想中解放出來，形成開放自由的創作風氣。文人創作因而發生變化，不再只以「諷喻教化」為其內容，而是題材多樣，並重視文學本身的抒情詠懷功能，從過去「勸諫教化」的內容轉為「抒懷情志」之層面，開啓了建安文學「彬彬之盛」的繁榮局面。綜上所述，推究此時期文學思潮變化之因有三：一為儒學式微，文學脫離經學附庸而取得獨立地位；二為曹氏父子的提倡，展現文學集團之力，致使作品風貌多變；三為詩歌內容的轉變，五言詩之大興，使得文學抒情功能得以展現。

（一）儒學式微

儒學的式微，對於文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儒家認為文學要依循原道宗經的正統，強調文學要表現倫理道德，發揮勸導諷喻的教化作用，因此排斥非現實的事蹟、虛美的辭藻和個人的空想與情感。使得個人的浪漫主義無法抬頭，導致文學僅是經學的附庸、是教化的工具，缺乏獨立的生命。直至漢末儒學因東漢王朝衰亡而失去維繫人心的功用，作家不再把文學視為闡發經義的工具，而是用來反映社會現實，抒發個人情感，文學逐漸擺脫千篇一律的創作僵局而取

⁵² 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頁9。

得獨立的地位，使文學在內容及風格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曹丕於《典論·論文》中，明確肯定文學價值，強調文學的獨立生命。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⁵³

丕視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指出文學有經國濟民之用。此說突破以往文學只是教化工具的觀點，賦予文學獨立之生命及價值，肯定文學具不朽價值。對於日後純文學發展，影響甚巨。而在文體辨析方面，明言文體與內容之關係者，亦自曹丕始。其《典論·論文》：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⁵⁴

其所舉四科，雖無法概括當時文體之全貌，然其範圍與後人之文學概念一致，可謂從形貌作為文章辨體之作始者。其後陸機將之擴為十類，劉勰於《文心雕龍》專列論文二十五篇，又蕭統析之為三十八類，至姚鼐、曾國藩析之愈密，此皆受曹氏之啟發也。曹氏此論一出，使得中國文學逐漸走上純文學之途。

（二）帝王提倡

一個時代文學的發展，與領袖人物或統治者的態度有很大關係，建安文學的繁榮昌盛，實得力於曹氏父子的領導與提倡。劉勰《文心雕龍·時序》：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

⁵³ 潘兆賢：《魏文帝曹丕評傳》（香港：向日葵出版社，2000年10月），頁40。

⁵⁴ 同註53，頁39。

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⁵⁵

曹操雅好詩文，重視文學的發展，對建安文學的興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他不但是傑出的政治家，亦是愛好文章的文學家。《魏書·武帝紀》：

太祖御事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⁵⁶

曹丕《典論·自序篇》亦云：

上雅好詩文書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好學則思傳，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者，唯吾與袁伯業耳。⁵⁷

由上可知，曹操雖隨軍南征北討，但在長達三十餘年的戎馬生涯中，仍舊手不釋卷，足見其愛好文學之心。由「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之敘述，顯示出曹操文學素養的不凡，並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而曹丕、曹植之文學創作及成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作為建安時代政壇與文壇的核心人物，曹氏父子對文學的愛好與提倡，在文學的繁榮發展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建安文人集團的形成，即是曹操愛才政策的具體實踐。曹植〈與楊德祖書〉：

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⁵⁸

漢末文士在戰亂中顛沛流離、散處各地，曹操以「唯才是用」的理念，積極網羅人才，集結王粲、孔璋、徐幹、劉楨、阮瑀、楊修、邯鄲淳、吳質、陳

⁵⁵ (梁)劉勰撰，王更生導讀：《文心雕龍·時序》，頁343。

⁵⁶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卷1，頁54。

⁵⁷ 同註29，頁1097。

⁵⁸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卷19，頁558-559。

琳、應瑒等人於鄴城，成爲鄴下集團的一分子，文人在此專事創作，爲文學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而曹操禮遇文士，愛才如命之態度，亦大大提高文人的政治地位。建安十六年，曹操爲曹丕設置五官將文學，並替他招攬文士爲其幕僚，同時也將部份文士納爲曹植所用，並賦予平原侯庶子之頭銜。建安諸子中，徐幹、王粲、陳琳、阮瑀、應瑒、劉楨都有擔任過司空軍謀祭酒、丞相掾屬之紀錄⁵⁹。

在鄴城生活期間，曹氏父子與建安諸子之往來多以吟詩作賦爲主要活動，曹操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⁶⁰，因而每每興之所至，往往邀賓客幕僚參與其事，形成集體性的文學活動。建安十七年，鄴城銅雀臺新成，曹操率眾親臨，作〈登臺賦〉，並命諸子同作，類似的情形非常普遍，形成文士們「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⁶¹的局面。

曹操平日軍國事繁，無暇參與諸多的文學活動，因此鄴下文人集團的核心無疑是曹丕、曹植兄弟。曹丕對文學既有濃厚的興趣，又有精闢的文學見解；曹植則是才高八斗、下筆琳瑯的文學天才。故在曹氏父子的大力支持及倡導下，文人開始了鄴下侍遊和文學創作的活動，掀起了一股強勁的文學熱潮，曹丕〈又與吳質書〉描述了當時的熱烈情況：

昔日游處，行則接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⁶²

曹氏父子不但禮遇鄴下諸子，更給與他們良好的政治地位，這樣安定且富裕的生活，使得鄴下文人展開自由的詩文創作活動。創作內容由原先描述戰爭頻仍、社會凋敝的情況，轉爲對曹氏父子的種種歌頌，以及平日宴遊的生活記錄，題材類型更加多樣化，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文學內容及風格，造就了建安文學的繁榮。鍾嶸《詩品·序》：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爲文棟，劉楨、王粲，

⁵⁹ 見《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卷 21。

⁶⁰ 同註 55。

⁶¹ 同註 55。

⁶² 同註 29，頁 1089。

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⁶³

正是在曹氏父子的倡導及推波助瀾下，文學看法及文風的轉變有了嶄新的精神面貌，是故鄴下文人集團的形成，建安文學的輝煌繁榮，曹氏父子的貢獻實功不可沒。

（三）詩歌內容的轉變

除了曹氏父子的大力提倡外，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是文學思潮轉變的內在因素，而客觀的社會現實則是造成思潮轉變的外在因素。

透過文學作品表達現實生活，是自《詩經》以來的優良傳統。然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文學在儒家「原道、徵聖、宗經」的桎梏下，成為闡發經義的內容，失去了表達情感的意義，嚴重阻礙文學的自由發展。直至漢末儒學衰微，加以曹氏兄弟的提倡，文學終於擺脫經學限制而得以自由發展，重新展現寫實抒情的功能。建安作家大量用文學來反映真實生活，抒發自身情感，開拓了多樣的題材內容與風格。

建安文人繼承《詩經》、《楚辭》、漢樂府民歌以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並加以創新，創作出許多優秀的作品。如曹操〈短歌行〉中借用《詩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來表達對賢才的渴慕之情，正是對《詩經》的借鑑及創新；而從曹植創作的遊仙詩中可發現其與《楚辭》的繼承關係；而漢樂府民歌所展現的現實主義對於建安文士更有著深遠且直接的影響。尤其是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更可明顯看出其與漢代樂府民歌之關係：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

⁶³（梁）鍾嶸撰，汪中選注：《詩品注》（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6年2月），頁8。

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⁶⁴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一詩無論在內容形式與表現技巧上，都與漢代樂府有相似或相近之處，本詩借用秦朝修築長城之事，揭露出繁重的徭役帶給人民的沉重負擔，展現深刻的寫實筆法；而在表現形式方面，漢樂府民歌使用對話的表現手法，而陳琳亦使用對話的形式。由此可知，建安作家不僅繼承了漢樂府的形式，而且在內容上也繼承了漢樂府的寫實特色，使詩歌能夠真實的反映現實，展現「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功能。

此外，五言詩的發展也是促使建安文學繁榮昌盛的主要原因。漢代，五言詩多在民間樂府中流傳，其內容為抒情言志之作。然自漢末儒學式微後，文學從僵化的經學束縛中解放出來，因而抒情功能得以展現，文人逐漸以五言詩來抒發個人情感，因此大量創作五言詩，藝術技巧也逐步提高。〈古詩十九首〉的出現，象徵著此詩體的創作，已達於成熟之境。其所描寫的思想內容、五言形式、抒情特色、藝術技巧，都為建安詩人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範本。由建安文人大量創作五言詩之現象，可知文學已掙脫了經學長期的枷鎖，走向重視情感表達的藝術層面。

建安文學的繁榮昌盛，是由外在的時代背景及內部的文學思潮相互發展而成。社會動亂的局面，造成許多慷慨悲涼的文士；儒家思潮的衰微，使得文學呈現解放之勢；曹氏父子的提倡文學，使得鄴下文士群起創作；五言詩體的成熟，表現文學的抒情精神，在以上種種因素交互影響之下，使得建安文學呈現出「彬彬之盛」的局面。而劉楨的作品，正是時代文風的展現。

⁶⁴ 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9 年 4 月），頁 34。